

中國哲學史

肖楚父 李錦全

主 編



中国哲学史

上 卷

肖楚父 李锦全 主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封面题字：侯外庐

封面设计：墨 谷

中国哲学史

ZHONGGUO ZHEXUE SHI

上 卷

肖蓬父 李锦全 主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6.625 印张 390,000 字

1982 年 12 月第 1 版 1985 年 10 月北京第 4 次印刷

印数 73,001—88,000

书号 2001·220 定价 2.80 元

06/0/03

编者的话

本书是由教育部根据一九七八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规划》组织编写的,可作为高等学校哲学系本科生学习中国哲学史课程的选用教材,也可作为高等学校有关专业选修或自学中国哲学史的参考书。本书共六编,分上下两卷。上卷包括:第一编夏殷周至战国初期,第二编战国中、晚期和第三编秦汉至隋唐时期;下卷包括:第四编北宋至明中叶时期,第五编明末清初时期和第六编鸦片战争至辛亥革命时期。

参加编写本书的单位有:(以笔划为序)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副主编)、四川大学、辽宁大学、武汉大学(主编)、武汉师范学院、南开大学、南京大学、湘潭大学等九所院校。

本书由肖蕙父同志任主编,李锦全同志任副主编。先后参加编写初稿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于世君、王友三、王兴华、王举忠、冯达文、刘蕴梅、朱光甫、朱森博、余光贵、邱明洲、李庆、李德永、李锦全、肖蕙父、吴熙钊、屈志清、罗炽、欧阳荣庆、张永路、张军夫、张儒义、唐明邦、贾顺先等同志。初稿写成并集体讨论后,王兴华、李德永、吴熙钊、罗炽、张儒义等同志又参加过分编修改和统稿工作。最后,由肖蕙父、李锦全二同志通读定稿。

本书所附《中国哲学史大事年表》,吸取了冯达文、朱森博、吴熙钊、屈志清、罗炽等同志的一些考订成果,由唐明邦同志整理定稿。全书名目索引,由王举忠、于世君同志编成。

本书印成送审稿后,由教育部于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召开审稿

会，邀请了张岱年、石峻、邬恩溥、吕希晨、刘蔚华、楼宇烈等同志进行评审，他们对书稿提出的许多宝贵意见，对我们最后修改定稿有很大帮助。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到社会科学院和一些兄弟院校的老专家和许多同志以及人民出版社的帮助和支持。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学者侯外庐同志为本书写了题签。我们谨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中国哲学史这门学科尚在建设中。编者水平所限，本书存在的缺漏和错误一定不少。恳望读者随时提出批评建议，容后补充修正。

一九八二年元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导 言 (1)

第一编 奴隶制时代(夏、殷、周至战国初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绪 言 (19)

第一章 夏、殷、周奴隶制发展时期哲学的产生和发展 (31)

第一节 夏殷时期哲学思想的萌芽 (31)

一、“绝地天通”的神权垄断——从自然崇拜
到上帝崇拜 (31)

二、“治水平土”的经验总结——从征服自然
的神话幻想到认识自然的哲学萌芽 (35)

第二节 殷周之际的政治变革和哲学思想的产生 (38)

一、殷末开明政论家的哲学思想 (38)

二、西周初统治集团的哲学思想 (40)

第三节 西周末年的社会动荡和哲学思想的发展 (45)

一、怨天、尤人思潮的兴起 (45)

二、五行、阴阳思想的发展 (49)

第二章 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潮和史墨、孙武的朴素

辩证法 (54)

第一节 春秋时期的无神论思潮 (54)

一、季梁、史墨的重民轻神思想 (54)

二、叔兴、子产的天人相分思想	(56)
第二节 晏婴、史墨的朴素辩证法思想	(57)
一、晏婴的“和与同异”、否可“相济”的思想	(58)
二、史墨的“物生有两”、皆有“倍贰”的思想	(59)
第三节 孙武的朴素唯物论和军事辩证法	(62)
一、《孙子兵法》中“知己知彼”的朴素唯物论思想	(63)
二、《孙子兵法》中“奇正相生”的军事辩证法思想	(65)
三、范蠡的“赢缩转化”的辩证法思想	(70)
第三章 孔丘的唯心主义哲学	(72)
第一节 “与命与仁”的世界观	(73)
一、由尊天思想到唯心主义的命定论	(73)
二、强调主观自觉精神的仁学思想	(76)
第二节 “学思”并重的认识理论	(80)
一、承认上智“生知”的先验论	(80)
二、重视学知，提倡“下学上达”的认识方法	(81)
第三节 “执两用中”的中庸之道	(84)
一、“和而不同”、“执两用中”的矛盾和谐论	(84)
二、三代相“因”、“损益可知”的历史发展观	(86)
三、“叩其两端”、“温故知新”的认识辩证法	(87)
第四节 孔丘思想的历史地位	(88)
第四章 墨翟的唯物主义经验论	(91)
第一节 “必以众之耳目之实”为基准的唯物主义 经验论	(92)
一、认识来源于“耳目之实”	(92)
二、“取实予名”与“察类明故”	(93)
三、“言必立仪”的三表法	(95)
第二节 “尚力”、“非命”与“天志”、“明鬼”的思 想矛盾	(97)

一、“尚力”、“非命”及对“命定论”的批判	(97)
二、“天志”、“明鬼”的神秘主义思想	(100)
第三节 “兼以易别”的社会矛盾观	(102)
一、“尚贤”、“尚同”	(103)
二、“兼爱”、“非攻”	(105)
三、“非乐”、“节用”	(106)
第五章 《老子》的唯心天道观和辩证发展观	(108)
第一节 以“道”为最高实体的宇宙观	(109)
一、“道”兼有两重属性	(109)
二、“道”生万物与“道法自然”	(111)
第二节 “静观”、“玄览”的神秘主义认识论	(115)
第三节 “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法思想	(118)
一、“有无相生，难易相成”	(118)
二、“反者道之动”	(120)
三、“挫锐”、“解纷”，“归根曰静”	(122)
四、复古倒退的社会历史观	(123)
第四节 《老子》哲学的历史地位	(125)

第二编 封建制形成时期(战国中、晚期)

哲学矛盾运动的展开

绪 言	(131)
第一章 子思、孟轲对儒家哲学的深化发展	(141)
第一节 子思“存诚尽性”的主观唯心主义	(141)
一、对孔丘“中庸”思想的发挥	(141)
二、以“诚”为核心的神秘认识论	(143)
第二节 孟轲“尽心知天”的天人合一思想	(145)
一、性善论——仁政学说的哲学基础	(146)
二、尽心、知性、知天的认识路线	(151)

三、英雄史观和历史循环论	(155)
第二章 道家分化中出现的两个重要哲学派别	(159)
第一节 《管子》书中《心术》等篇的唯物主义	
“精气”说	(159)
一、“道”即“精气”的唯物世界观	(159)
二、“静因之道”的消极反映论	(163)
第二节 庄周的唯心主义和相对主义	(165)
一、“物物者非物”的天道观	(166)
二、以相对主义为基础的认识论	(169)
三、“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宿命论	(175)
第三章 名辩思潮和后期墨家	(181)
第一节 惠施“合同异”的哲学观点和逻辑思想	(182)
第二节 公孙龙“离坚白”的哲学观点和逻辑思想	(188)
第三节 后期墨家的自然哲学和逻辑理论	(195)
一、后期墨家的哲学观点	(197)
二、后期墨家的逻辑理论	(202)
第四章 总结先秦百家争鸣的荀况哲学	(208)
第一节 “明于天人之分”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209)
一、天道自然的思想	(210)
二、“天行有常”的思想	(211)
三、“天人相分”的思想	(212)
四、“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	(213)
第二节 “虚壹而静”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14)
一、“天官簿类”和“心有征知”	(214)
二、“虚壹而静”以“解蔽”的认识方法	(216)
三、“学至于行而止”的知行观	(220)
四、“制名以指实”的逻辑思想	(222)

第三节	“化性起伪”和“明分使群”的人类史观	(226)
一、	“人之性恶”与“化性起伪”	(226)
二、	“明分使群”的社会起源说	(229)
三、	厚今薄古与“古今一度”、“虽久同理”的矛盾	(232)
第四节	对百家争鸣的理论总结	(234)
第五章	总结变法运动历史经验的韩非哲学	(237)
第一节	“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的历史 进化论	(237)
一、	“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的社会发展观	(237)
二、	法、术、势相结合的法治思想	(239)
第二节	“道理相应”的唯物主义规律观	(241)
一、	“万物各异理，而道尽稽万物之理”	(241)
二、	“缘道理以从事，无不能成”	(243)
第三节	注重“参验”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245)
一、	反对“前识”，坚持唯物主义的认识原则	(245)
二、	“循名实而定是非，因参验而审言辞”	(247)
第四节	矛盾之说和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249)
一、	关于矛盾的同一性和不平衡性的思想	(250)
二、	关于矛盾转化的条件性的思想	(252)
三、	关于斗争在摧毁旧事物中的作用	(253)
第六章	邹衍和《易传》的哲学思想	(255)
第一节	邹衍的哲学思想	(255)
一、	“五德终始”的历史观	(257)
二、	“以小推大，以今推古”的方法论	(259)
第二节	《易传》的哲学思想	(262)
一、	《易传》的宇宙生成图式及其思想体系的矛盾	(262)
二、	《易传》的辩证法思想及其形而上学归结	(266)

第三编 封建社会前期阶段(秦汉至隋唐)

哲学的发展

绪 言	(275)
第一章 秦汉之际的哲学思潮	(285)
第一节 秦及汉初新兴地主阶级建立封建统治 思想的理论准备	(285)
第二节 汉初黄老之学的朴素唯物论	(291)
一、汉初黄老“无为”思想	(291)
二、《黄老帛书》中的哲学思想	(294)
第三节 贾谊政论中的辩证矛盾观	(304)
第二章 汉代正宗神学的奠基者董仲舒的哲学思想	(313)
第一节 董仲舒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	(313)
第二节 “天人感应”的神学目的论	(315)
第三节 “深察名号”的唯心主义认识论	(322)
第四节 “物必有合”、“天道不变”的形而上学	(325)
第五节 董仲舒哲学的历史作用	(328)
一、董仲舒的历史地位	(328)
二、董仲舒与谶纬神学	(331)
第三章 战斗无神论者王充的哲学思想	(336)
第一节 王充哲学的历史前提和思想渊源	(337)
第二节 “元气自然”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对 天人感应论的否定	(340)
第三节 “疾虚妄”、“重效验”的唯物主义认识 论——对圣人神而生知论的否定	(348)
第四节 “殊气相革”的朴素辩证法和自然定命 的形而上学的矛盾	(352)

一、“同气相成，殊气相革”的辩证法思想	(352)
二、“命不可勉，时不可力”的自然定命论	(356)
第五节 “汉盛于周”的历史进化观和“百代同	
道”的历史循环论的矛盾	(359)
一、“汉盛于周”的历史进化论	(359)
二、“百代同道”的历史循环论	(362)
第六节 王充哲学的历史地位	(363)
第四章 三国西晋时期的玄学思潮	(365)
第一节 玄学的产生及其演变	(366)
一、玄学产生的社会基础	(366)
二、玄学思潮的演变过程	(368)
第二节 王弼的“贵无”论	(372)
一、“以无为本”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373)
二、“静为躁君”的形而上学动静观	(377)
三、“得意忘象”的神秘主义认识论	(379)
第三节 郭象的“独化”论	(381)
一、“万物独化”的唯心主义本体论	(382)
二、“冥而忘迹”的神秘主义认识论	(385)
三、“大小俱足”的形而上学诡辩论	(387)
第五章 反玄学思潮在斗争中发展	(391)
第一节 嵇康的“名教不合自然”论	(391)
一、“元气陶铄，众生禀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	(392)
二、“求之自然之理”的唯物主义认识论	(395)
三、“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政治论	(397)
第二节 杨泉的《物理论》	(399)
一、《物理论》中的气一元论	(400)
二、《物理论》中的自然辩证法	(402)
三、杨泉思想的批判性	(404)

第三节	欧阳建的“言尽意论”	(406)
第四节	鲍敬言的“无君论”	(408)
第六章	东晋南北朝佛教哲学的传播和发展	(412)
第一节	佛教传播的社会历史条件	(412)
第二节	般若空宗的传入及其与玄学的合流	(415)
第三节	僧肇的“般若”学	(419)
一、	“即万物之自虚”的本体论	(419)
二、	“即动而求静”的动静观	(424)
三、	般若“无知、故无所不知”的认识论	(428)
第四节	慧远的“法性”论与竺道生的“涅槃”学	(430)
一、	慧远的“法性不变”论	(430)
二、	竺道生的“顿悟成佛”说	(433)
第七章	反佛的战斗无神论者范缜的哲学	(436)
第一节	范缜《神灭论》及其思想先驱	(436)
第二节	《神灭论》对形神关系的唯物主义论证	(439)
一、	“形神相即”的新命题	(439)
二、	“形质神用”的新范畴	(440)
第三节	关于世界的物质性及其质的多样性和变 化性的辩证分析	(442)
一、	区别不同的“质”有不同的“用”	(442)
二、	“生灭之体”的“渐变”与“激变”的变化观	(443)
第四节	《神灭论》的理论贡献与局限	(444)
第八章	隋唐时期佛教哲学的新发展	(447)
第一节	隋唐佛教哲学的社会基础及理论特征	(447)
一、	隋唐佛教的社会基础	(447)
二、	隋唐佛教的理论渊源	(449)
三、	隋唐佛教哲学的一般思辨结构	(451)
第二节	华严宗的客观唯心主义的“法界缘起论”	(453)

一、“立破无碍”的判教理论	(454)
二、“心尘”互为缘起的唯心主义本质	(458)
三、“四法界”说中貌似辩证法的神学思辨	(461)
第三节 禅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顿悟成佛论”	(470)
一、禅宗“革新”佛教的社会根源	(470)
二、禅宗主观唯心主义体系的主要环节	(472)
三、禅宗哲学思想的历史作用	(480)
第九章 韩愈、李翱的唯心主义哲学	(483)
第一节 韩愈的唯心主义道统论	(483)
一、客观唯心主义的道统虚构	(483)
二、“顺天”、“合道”，性分“三品”的形而上学	(487)
三、圣人创制立法的唯心史观	(489)
第二节 李翱的唯心主义复性论	(491)
一、性善情邪的僧侣主义人性论	(491)
二、直觉主义的认识论	(493)
第三节 韩愈、李翱哲学的历史影响	(495)
第十章 柳宗元、刘禹锡的唯物主义无神论体系	(497)
第一节 柳宗元的战斗无神论	(498)
一、“元气自动”的自然观	(498)
二、天与人“不相预”的无神论及其对传统神学的批判	(500)
第二节 刘禹锡的朴素辩证法	(503)
一、对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的论证	(503)
二、“天与人交相胜”的朴素辩证法及其对 神学根源的揭露	(506)
第三节 柳宗元的历史发展观	(512)
第四节 柳宗元、刘禹锡哲学的历史地位	(516)

导 言

中国哲学史是一门发展着的科学。中国哲学史之成为一门科学,有其发展的历史过程;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还需要继续沿着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所开辟的认识道路不断地发展。

在中国古代,早就有对前代学术思想成果进行总结性评述的论著,诸如《庄子·天下篇》、司马谈《论六家要旨》、宗密《华严原人论》、朱熹《伊洛渊源录》,直到黄宗羲主编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等;这些论著,按不同的时代要求,从不同的思想角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至今对哲学史研究仍有参考价值。但由于古代社会分工和学术分类的局限,哲学还与其他非哲学的社会意识形态浑沦未分,被包容在所谓“内圣外王之道”、“天人性命之学”的庞杂体系之中。哲学史还不可能成为独立的学术部门。

哲学史的专门研究伴随着哲学的独立化而始于近代。在西方,近代资产阶级哲学冲破了神学网罗而独立发展,曾被囊括在神学中的各个学术部门相继独立,于是有了哲学和哲学史的专门研究;又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由黑格尔系统化的演述而总其成。黑格尔基于唯心辩证法所形成的哲学史观及对一系列方法论问题的探讨,曾在哲学和哲学史上作出划时代的贡献,被马克思赞为“开始奠定哲学史的基础”,并实际成为马克思主义创立科学的哲学史观所继承和改造的直接理论前提。在中国,近代是畸形的。中国资产阶级政治上软弱,文化上落后,因而哲学发展极不成熟;但毕竟在广泛汲取西方哲学的过程中,逐步摆脱了封建“经学”等传统

束缚,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哲学和哲学史的独立研究。经过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人的钩稽撰述,到五四前夕出现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嗣后,一些学者如冯友兰、萧公权、范寿康、唐君毅、钱穆等以类似论著,踵事增华,颇有发展。他们的研究成果,比古代学术史论大有进步,为中国哲学史适应近代学术分工的要求而独立成科,作出了历史贡献。但是,他们在研究中所采取的哲学史观及其方法,却落后于“五四”以后整个文化思潮的迅猛发展而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总的说来,这些论著,往往陷入浅薄的唯心史观,停留于对历史上某些学派的分合和思潮起伏的现象形态的描述,谈不上对哲学发展的本质矛盾和内在规律的阐释,在方法上还未能达到黑格尔阐述西欧哲学发展所显示的思维水平,也未能真正跳出中国古代学术史论的某些陈旧的窠臼。

“五四”以后,中国新旧文化思想的激烈冲突中涌现出马克思主义的生力军。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在中国的蓬勃展开,首先在社会史领域,然后在思想史领域,以郭沫若等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作了巨大的开拓性工作。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以无可辩驳的科学锋芒,解开了许多中国古史之谜。三十年代起,吕振羽、杜国庠、侯外庐等发表的有关中国思想史、哲学史的一些论著,使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与中国哲学发展的特点初步结合,破除了不少封建社会传统意识用以解释历史的迷信,批判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滋生的某些思想偏向和种种非历史主义的臆说,这就为中国哲学史走向科学化开辟了道路,奠下了基石。

解放以后,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哲学史这门年轻的科学,得到空前的繁荣和发展。尽管在发展过程中有过干扰,走过弯路,尤其“左”倾思潮的一再作祟,曾产生过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公式化、庸俗化、贫乏化等不良倾向。但三十年来,历史资料的整理,方法论问题的研讨,重要考古文献的发现,研究成果的积累,

科学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结束了十年动乱之后，迎来学术解放的春天，为拨乱反正而展开的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观的理论研究日益深入，许多学术问题的争论得以正常开展，一些新的研究领域逐步开辟，这一切，推动着作为一门科学的中国哲学史在更坚实的基础上建设起来。

当然，在科学的道路上，“直行速获而可以永终”的事情是没有的。目前，中国哲学史的科学化建设还有待从多方面努力推进，特别需要进一步研究、解决一些基本的理论、方法问题。我们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曾经注意到以下一些问题。

首先，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科学，它所研究的特定对象、论述的重点范围、史料的筛选原则，似应得到进一步的科学规定。这是一个历史遗留的问题。在西方，经过资产阶级哲学发展的整个历史阶段，原被包容在哲学中的各门科学以及与哲学关系最密切的伦理学、美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都相继独立出去，并各有自己的专门史。哲学的概念逐步净化，从而哲学史研究的特定对象也逐步明确。特别是黑格尔提出了“哲学史由于它的题材的特殊性质而与别的科学史不同”，必须把其他精神文明的材料排斥于哲学史之外，“哲学史才会达到科学的尊严”（《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第12—13页）等思想，西欧哲学史的研究范围和史料筛选等问题，似乎得到了历史的解决。由于历史条件不同，中国长期封建社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文化遗产和笼统的学术分类传统，近代又流行着所谓“中国哲学属于伦理型”、“中国古代哲学家缺乏逻辑思维”、“中国哲学主流之进展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之类的论断，影响到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范围难定、对象不明，往往因人而异地把未经筛选的各种思想资料纳入哲学史，似乎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以而且应当去分担政治、伦理、法权、宗教、教育等思想史的研究任务。这样，哲学史或仍被沉没在一般思想史、学术史之中，或由于研究的对象不